

社會反應與情性書寫——劉大杰、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中的 《紅樓夢》

一、前言

清朝末年中國開始接受西方教育概念、學科意識、採取西式教育制度，中國的大學效仿日本大學的建制，設置「文學史」(literature history)課程，使用此一全新學術語言，重新敘述中國文學的過往歷史¹。時至今日「中國文學史」(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)此一學科，不僅是中國文學系必修學分，也是理解中國古代文學、建立中國文學系知識分類、認知、組成系統，形成中國古代文學論述系統必經的途徑。

當今的文學史研究者，認為文學史的書寫是將「文學的過去圖式化，以便於教育觀察認知、教育後輩²」。「所有的歷史，都是史家詮釋下的歷史，非純然止於史料的整合的歷史；於是，每位文學史撰寫者的學養、視角及其對文學史論述的詮釋能力，便成為他再現文學歷史圖貌的根據³」。那麼，文學史論述的研究，除了可以理解學科[discipline]知識建構外，也是理解文學史作者個別文學主張、文化關懷、文學意義詮釋、文學評價的不二法門。

初版於四十年代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、初版於六十年代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著作，是台灣流傳最廣的兩本文學史教材。台灣教授中國文學史教師，上課時並不贊成劉大杰先生書中的文學史觀與其論述內容，於是採用刪除意識型態字眼的方式教學⁴。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在選材、論述內容上，是以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為基礎，加入臺靜農早先上課或發表過文章的觀點，增補而成自己的文學史著作⁵。兩者之間形成海峽兩岸中國、台灣政治實體，五十年代與現代學術間，同中有異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實描述、兩人的文學理念也同中有異。而台灣的學子，便是在此狀態下認知中國古代文學、解釋中國古代文學。換言之，討論兩者的文學史論述，其實正是理解五四以來民國學者如何建構「中國」及「中國文學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學術論述的問題。1949年後臺灣、中國的中國文學系如何建構「中國」及「中國文學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學術論

¹ 參見戴燕《文學史的權力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)頁1。

² 參見陳國球〈文學史的思考〉一文，收於陳國球、王宏志、陳清僑編《書寫文學的過去——文學史的思考》(台北：麥田出版公司，1997年3月)頁10。

³ 參見王基倫〈台灣各大學中國文學史教材之分析〉(台北：文訊月刊，2009年1月)頁54。

⁴ 參見許建崑〈讀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十四章〉www.wretch.cc/blog/xuxuxu/2254973

⁵ 參見註3王文，頁57。

述的問題。

以往的研究中，台灣學者龔鵬程先生、王文進先生，均曾撰文分析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中國大陸學者更是多人撰文分析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。台灣學者康韻梅先生撰文分析葉慶炳先生古典小說研究，王基倫先生分析台灣各大學中國文學史教材，針對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、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，提出概略性論述⁶。也許是因為全本比較、研究工程浩大，雖然論題重要，目前並沒有比較兩本中國文學史論述的研究論文發表。基於此一緣故，筆者身為紅學研究者，以個人研究專長，認為兩位先生中國文學史內《紅樓夢》論述，繼承了五四時期胡適新紅學實證、實錄觀紅學典範，又各自發展為社會反應、情性書寫兩套文學史論述。可以做為取樣、研究對象，用來分析他們文學史觀念中，歷史理論為何？歷史判斷為何？歷史評價為何？文學理論為何？文學判斷為何？文學評價為何？繼承了怎樣的五四學者建構「中國」及「中國文學」、「中國歷史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觀念？建構了怎樣的中國、臺灣中國文學系「中國」及「中國文學」、「中國歷史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學術論述？

二、線性、實證歷史觀

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⁷書名即強調「發展」二字，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緒論即強調「故研究各時代文學演變之學問，即為文學史。我國古時並無文學史之著作。正史之文苑傳、文學傳文藝傳皆為文學家之傳記，甚少涉及作品探討；文選玉台新詠藝文類聚等總集亦止於羅列作品，而不研究其流變，兩者均為文學史材料而已⁸。」書名中的發展、緒論中流變二語，均指向二人接受西方史觀，認為：「歷史發展是線性的、有意志的、導向某一個目標的、或是向上的、不會重覆的、前進而不逆轉的⁹」線性史觀。故兩書的歷史分期，是由政

⁶ 參見龔鵬程〈中國文學史自序〉收於氏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2009年）頁1。王文進〈新文化運動反映下的文學史寫作——劉大杰以民間文學為主流觀點的檢討〉收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《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81年）頁17—28。康韻梅〈小說之「史」、「藝」、「趣」——試述葉慶炳先生古典小說研究的三大面向〉（花蓮：東華人文學報，第十二期，2008.1）頁167—195。王基倫先生文章參見註3王文。

⁷ 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曾經三次修改，分別是民國30年（1941）初版、1957年版、1962年版、1973、1976年版。參見賈毅君〈文學史的寫作類型與文本性質——論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的三次修訂〉（天津：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，第3卷第3期，2001.9）頁213。台灣地區於民國45年由中華書局照相翻印初版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刪去卷首序文，改名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。隨著劉大杰先生修訂書籍，後來台灣華正書局也數次翻印此書，正名為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台灣流傳最廣的版本是1957年版，故本文以華正書局翻印此版為論述底本，詳細內容參見註3王文。

⁸ 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76年）頁3。此增修版亦是葉慶炳先生流傳最廣的版本，故本文以此版為論述底本。

⁹ 參見王汎森〈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〉（台北：新史學，第十九卷二期，2008.6）頁2。王汎森先生認為進化論史觀，是近代中國線性歷史觀分支，本文從之。

治實體時間性做線性向前發展切割。劉大杰先生從殷商時代開始→周代→秦代→漢代→魏晉時代→南北朝→隋代→唐代→五代→宋代→元代→明代→清代¹⁰。葉慶炳先生從周代開始→先秦→漢代→魏晉時代→南北朝→唐代→五代→宋代→元代→明代→清代¹¹，將古代中國文學安排進此一單線、由古而今、向上的、前進而不逆轉的，由上古、中古、近世向現代發展線性歷史軌道中。

其次是以西方社會進化論為普世價值、普遍原則，西方文類概念為填空位置，配合歷史環境的變化，來類推、分析具有漢民族意識的中國古代文學，由簡而繁必然發展的起源、過程、特色，與環環相扣的線性歷史因果關係。劉大杰先生建構的藍圖是：巫術文學（神話、散文）→周詩（詩經）、歷史散文、哲理散文、楚辭→秦賦、銘→漢賦、史傳文學、詩歌→魏晉文學思潮、神怪小說→建安詩人、正始詩人、永嘉詩人、陶淵明→南北朝形式主義山水文學、色情文學、文學批評、小說、民歌→唐代古文、短篇小說、變文、初、盛、中、晚詩歌→五代詞→宋代古文、詞、詩、小說、戲曲→元代散曲、雜劇→明代散文、戲曲、小說、散曲、民歌→清代詩歌、詞曲、小說。葉慶炳先生建構的藍圖是：周代詩經、春秋戰國散文、楚辭、先秦神話與寓言→漢賦、漢代散文、漢代詩歌→魏代文學→兩晉詩歌→南朝文學、南朝詩人、魏晉南北朝小說→初、盛、中、晚唐詩、唐代散文、唐代傳奇與變文→晚唐五代詞→北宋詞、南宋詞、宋詩、宋代散文、宋代話本與諸宮調→元代散曲、元代雜劇→明代文學思想與散文、明代散曲、明代傳奇、明代小說→清代詩文、清代詞曲、清代小說。由此更可見兩書承繼新文學運動之後，文學史以進化論觀點，論述中國古代漢民族文學從詩三百進化到騷賦、五七言古詩、五七言近體詩、詞、曲，神話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等文類演變的痕跡。

以此一原則論述《紅樓夢》地位，劉大杰先生認為：「曹雪芹的紅樓夢，不單是十八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傑作，它同詩經、屈賦、史記、李杜詩歌、關王雜劇和水滸這些好作品，在中國三千多年來的古典文學歷史上，形成綿延不斷的文學高峰，由於它們在藝術上的優異成就，高度地表現了我們民族的創造精神和風格，成為民族文學中最珍貴最光輝的遺產。《紅樓夢》在文學史上的價值，不僅是中國的，而且是世界的¹²。」葉慶炳先生認為：「明、清長篇小說中，取材自家庭故事者，以《金瓶梅》、《紅樓夢》為最著。而前者重欲、後者言情。我國小說史上，《紅樓夢》實為最完美最有價值者¹³。」

第三，進化的目的性，是從舊文學、舊文體邁向新文學、新文體，由已知的過去，導向可知、向上的、世界的未來新文學。此點在二人論述清代文學時特別明顯，劉大杰先生說：「清代文學的職能，是三千年來各種舊文學舊文體的總結，同時孕育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的萌芽¹⁴。」葉慶炳先生說：「清代文學在中國文

¹⁰參見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民國72年）頁1—13。

¹¹同註8葉書，上冊、下冊頁1—5。

¹²同註10劉書，頁1074。

¹³同註8葉書，下冊頁410。

¹⁴同註10劉書，頁1008。

學史上之意義，為各種舊文學體裁之復興與總結束¹⁵。」在此史觀下清代文學成爲中國舊文學、舊文體（文言文學）進化的頂點，之後便是白話文學取代它，才是中國文學進化的唯一軌跡，不可能逆轉。

第四，文學史家的義務，是以實證的方法蒐集、整理、考訂與辨僞文學（包括作者、社會背景作品）史料，考察、描寫中國古代文學進化軌跡的「事實」。以《紅樓夢》論述而言，劉大杰先生認爲：「由於這些附會和曲解（指索隱紅學與道學），長期地掩蔽了這一偉大作品的文學本質，忽略了它反映時代和客觀現實的真實精神¹⁶。」葉慶炳先生認爲：「書中故事，陳康祺燕下鄉脞錄，張維屏松軒隨筆皆以爲記述納蘭明珠家事，寶玉即納蘭性德。王夢阮紅樓夢索隱則力主影射清世祖與秦淮名妓董小宛情事。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又謂此書乃康熙朝政治小說。諸說均屬猜測之詞，不足憑信。《紅樓夢》實爲雪芹居京師西郊時回憶往事，懺悔生平之作¹⁷。」也就是說，他們認同歷史具有真實性，文學史家透過客觀的考證方式，可以還原、敘述歷史之真。文學史家必須撇開成見、擱起感情、認得事實、跟著證據走，才能考察、描寫中國古代文學進化軌跡的「事實」。而劉大杰先生更強調文學作品產生的社會環境、歷史真實性。因此，兩人在紅學史料擇取上，一致採取胡適新紅學自傳派觀點，認同胡適考證作者、本事、版本的研究方式，贊同《紅樓夢》作者爲曹雪芹、續作者爲高鹗、《紅樓夢》是曹雪芹自傳性質小說，反對沒有直接、具體史料可以考證的諸多索隱紅學說法。

三、 劉大杰：社會反應文學觀

如前所述，在線性、實證歷史觀之下，劉大杰先生認可胡適新紅學自傳派紅學史料，他採取社會反應論位置，閱讀、論述這些史料。在其社會反應論位置看來，文學反應人民、群眾、社會，只有融入人民、群眾、社會情況的文學，才是理想的文學。他說：

《紅樓夢》雖是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，然絕不是一點一滴地記載著自己的家世和歷史。曹雪芹是以自己的家世和生活體驗為基礎，加以社會上耳聞目見的各種人物和事件，經過細心的觀察和體會，再經過剪裁和創造而寫成了這部傑作。《紅樓夢》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是以曹家為底子，但創造完成以後，賈家便成為舊時代貴族家庭的典型，它概括了無數貴族家庭的特性、本質和命運。就在這裡，形成了《紅樓夢》基礎的深厚與代表性的廣闊以及文學價值的巨大。我們絕不能把《紅樓夢》看作是盧騷的《懺悔錄》，

¹⁵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337。

¹⁶同註 10 劉書，頁 1074。

¹⁷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409。

絕不能把《紅樓夢》看作是曹雪芹真實的自傳¹⁸。

借用韋勒克（René Wellek）、及沃倫（Austin Warren）的說法，他是用文學的外緣研究法¹⁹，討論作者曹雪芹生平、心理、社會、思潮、《紅樓夢》的社會背景，以及社會階級理論，界定曹雪芹所身處的社會情況。寫實主義反應論，界定曹雪芹《紅樓夢》書中的內容意義。以此辯駁胡適自傳派紅學實證、實錄、家事說主張、王國維紅樓夢悲劇主張，論證《紅樓夢》的文學價值、在文學史上不朽的意義。

故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中對《紅樓夢》的敘述，便由此核心概念展開。從清代封建社會、貴族子弟繁華落盡、寫實血淚反應史，開始建立曹雪芹其人、其事、《紅樓夢》小說創作背景、文學價值、文學史價值。他說

耳聞目見以及薰陶感染的，是那些舊時代的文藝空氣和那種奢侈華美的物質生活。他的一生經歷著曹家由榮華而至於衰敗的過程。這一位世家子弟，到了晚期，遭受到極其窮困的生活境遇。……曹雪芹在他衰敗破落的窮困的晚年，在生活上在情感上完全離開了往日優越地位，用他的血和淚，用他整個生命，用他最鋒利最藝術的文筆，創造出光輝無比的《紅樓夢》。……《紅樓夢》是通過各種人物的活動，宮廷貴族的勾結與矛盾，各種男女戀愛的葛藤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瑣事，生動而又真實地描繪出一幅貴族家庭衰敗歷史的圖卷。《紅樓夢》這一悲劇的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，絕不是單純地建築在賈寶玉、林黛玉戀愛失敗的基礎上，而主要的是建築在揭露貴族家庭的驕奢淫佚上。由於種種的腐爛與罪惡，結果是應了秦可卿所說的樹倒猢猻散的預言，使《紅樓夢》在結構上一反舊有小說的大團圓形式，而創造了極高的悲劇的美學價值。在中國古典小說裏，專就結構的完整與佈局的細密上說，很少有其他作品能比得上《紅樓夢》……在清代社會裏，賈雨村、雲光一類的人物，決不是個別的，而是普遍存在的，賈赦鳳姐一類的權貴，也不單是賈家才有，在所有的顯宦世家裏，同樣存在著大小不同的賈赦和鳳姐。他們普遍性愈大，就愈能反映出政治的黑暗和民生的困苦。這些生動深刻的描寫，使《紅樓夢》成為偉大的文學傑作……《紅樓夢》是清代社會的一面鏡子，曹雪芹生長於雍正、乾隆年間，這是清帝國政治的最盛期，也是開始衰微、沒落的時期。中國的歷史文化，從周代開始經過了將近三千年的長流，到這時候，一面放射出爛熟的幽光，同時呈現出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的晚景。《紅樓夢》這一偉大的作品，就出現在這一轉捩的時代，曹雪芹以深厚的學問與豐富的常識，把當時清代社會累積起來的文化知識，幾乎包羅無遺地一齊安插

¹⁸同註 10 劉書，頁 1082。

¹⁹ 轉引自王宏志《歷史的偶然——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1997）頁 37。

在《紅樓夢》²⁰。

這段以社會反應為視角的論述裡，出現了幾個預設對比位置與概念，舊時代、新時代，奢侈華美、衰敗破落，政治的黑暗、民生的困苦，衰微時代、轉捩時代。這些預設位置下的概念是：舊中國貴族家庭奢侈華美、腐爛罪惡，舊中國政治黑暗、民生的困苦，清朝是舊中國文化最興盛的時期，也是將走下坡的時期。命運蹇困的舊中國才子曹雪芹，用他深厚的學問、豐富的常識、藝術的文筆、完整的結構、細密的佈局，如實反應了舊中國社會、舊中國文化、舊中國貴族家庭、舊中國政治的燦爛與黑暗、奢侈與腐爛、華美與困苦，所以是一本不朽的傑作。言外之意則是從新時代的文學史家看來，舊才子、舊文學、舊文化、舊中國都是遺產，反應舊時代之惡與美的文化、歷史、社會的客觀遺產。無庸置疑，文學與舊中國社會、舊中國文化、舊中國政治、舊中國貴族家庭、舊中國才子，簡化、機械式對照關係，根本就是社會史研究視角，他的文學史論述、紅學論述也成為社會史附庸，《紅樓夢》成為反應舊中國社會階級史實錄。而文筆、結構、佈局這些屬於文學本質的研究，也依附在此觀念下展開論述，他認為《紅樓夢》精於描繪貴族家族人物典型性格、文學結構上對於舊家族不合理制度的反抗、封建社會的悲劇處理甚好，塑造了舊社會男男女女、性格明朗的典型人物藝術形象，永留人心²¹。

因此，評論高鶚續書功過時，自然不能接受靠攏封建社會權力的情節安排。認為「他所續補的部分，大體上沒有違背作者的原意，完成了《紅樓夢》的悲劇。後四十回文字雖不如前八十回的優美，沐天恩延世澤，雖減少了悲劇美的氣氛，但高鶚的文學成就，仍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²²」。

這樣的文學觀念，與胡適的看法同中有異。文學是作者反應論、文學反應時代、文學與作者、時代與文學觀念，文學進化主張與胡適一致²³。強調文學反應人民、群眾、社會歷史黑暗面，就往唯物史觀傾斜了。賈毅君先生指出：劉大杰先生三次修訂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「主要的變動是文學史料增添，與唯物史觀從敘述方法之一，躍為決定文學史現象的規律²⁴」。最終唯物史觀成為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裡，唯一的文學史觀。雖然有政治上的不得不然，卻也是思維模式、理論傾向上的不得不然。

四、 葉慶炳：情性書寫文學觀

²⁰同註 10 劉書，頁 1076—1081。

²¹同註 10 劉書，頁 1082—1086。

²²同註 10 劉書，頁 1086。

²³關於胡適文學理論，參見陳國球〈傳統的睽離——論胡適的文學史重構〉，頁 25—84。收於註 2 陳書。

²⁴參見賈毅君〈文學史的寫作類型與文本性質——論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的三次修訂〉（天津：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，第 3 卷第 3 期，2001.9）頁 213。

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採取情性書寫位置，閱讀、論述胡適新紅學自傳派紅學史料。他以西方小說（Fiction、Novel）文類概念為基礎²⁵，從作者小說觀念、作品風格、題材、結構、敘述手法入手，論證《紅樓夢》是我國小說史上最完美最有價值作品。

首先，他引用《紅樓夢》第一回內文，「我想歷來野史，無非假借漢、唐的名色，莫如我這石頭所記，不借此套，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，反倒新鮮別致。況且那野史中，或訕謗君相，或貶人妻女，奸淫兇惡，不可勝數。更有一種風月筆墨，其淫穢污臭，最易壞人子弟。至於才子佳人等書，則又開口文君，滿篇子建，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，且終不能不涉淫濫。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，如劇中小丑一般。更可厭者，之乎者也，非理即文。大不近情，自相矛盾。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，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跡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悶；至於幾首歪詩，亦可以噴飯供酒。其間離合悲歡，興衰際遇，俱是按跡循踪，不敢稍加穿鑿，至失其真²⁶」。指出曹雪芹有進步新穎小說觀念，故《紅樓夢》雖亦是才子佳人故事，而寫來全然不落窠臼²⁷。

此說法其實傳承自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引述《紅樓夢》此一原文，並認為《紅樓夢》「全書所寫，雖不外悲喜之情，聚散之跡，而人物事故，則擺脫舊套，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。……蓋敘述皆存本真，聞見悉所親歷，正因寫實，轉成新鮮²⁸」。魯迅原文但言與先前之人情小說作品風格大不同，未言曹雪芹小說文類概念進步新穎，而葉慶炳先生轉出此說。他大概認為曹雪芹擺脫其他中國古典小說，那些借古喻今、諷刺、淫穢、浮濫、公式的書寫方式。以親身的體驗、寫實的態度、真實的感情、自由的想像，書寫《紅樓夢》。可證曹雪芹進步新穎小說觀念、《紅樓夢》不落窠臼。

其次，他認為有此進步新穎小說觀念，故寫作時題材選擇真實動人，寫來合情合理，加以寶玉的愛情糾紛屬於曠古悲劇，先天上即已佔盡優勢。結構又完整、細密表達出寶玉、黛玉之戀愛，與賈府盛衰兩大主線，頭緒雖繁、人物雖眾，卻脈絡井然，毫無支離凌亂之痕。敘述手法又浪漫、寫實兼用，以寫實手法書寫顯

²⁵小說一詞在西方是多義的概念，可以相關至 Fiction(小說)與 Novel(小說)間篇幅長短的意義。Novel(小說)刻意虛構的想像、新聞、敘事性、散文體故事意義，也有 Romances(傳奇故事)意義，一種充滿真實情感、自由想像、解放的故事，其內容與冒險、騎士精神、或愛情有關。參見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《關鍵詞：文化與社會的詞彙》（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2005）頁 181-184、418-421。

²⁶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410。

²⁷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410。

²⁸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社，1992）頁 291—292。此處或可為王基倫先生云：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在選材、論述內容上，是以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為基礎，加入臺靜農早先上課或發表過文章的觀點，增補而成自己的文學史著作。臺靜農早先上課或發表過文章的觀點一說，提供若干證據。

貴家族的沒落，浪漫情調書寫寶玉、黛玉間愛情場面，交錯之間搖曳生姿。書中要角口語、對話刻畫成功，可謂是《水滸傳》以來之最佳口語文學²⁹。

最後，此書因為題材、結構、敘述手法、對話刻畫寶玉的愛情糾紛成功，風行不已。晚清時人筆記已記載讀者林黛玉、薛寶釵論爭，可見「清代之紅樓夢迷已分擁林黛玉與擁薛寶釵兩派，此書之深入人心，不待言矣³⁰」。

因此，他評論高鶚續書功過時，也以高鶚能把握全書主要脈絡，文筆亦相差不遠。主張「高鶚對《紅樓夢》實功多於過。此書苟不幸落入庸俗文人之手，續成一夫二妻大團圓喜劇，則誠令吾人哭笑不得矣³¹」。

由此可知，雖然沿用了胡適新紅學自傳派紅學史料、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紅學史料，雖然文學與作者、時代與文學觀念，文學進化主張與胡適一致。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中，將其轉向韋勒克(René Wellek)及沃倫(Austin Warren)所云：文學的本質研究法³²，界定《紅樓夢》為曹雪芹以親身的體驗、寫實的態度、真實的感情、自由的想像，化成書中主角賈寶玉，書寫而成的曠古愛情悲劇小說。在作者進步、新穎的小說觀念下，它是一部題材、結構、敘述手法、對話書寫完美之中國古典小說傑作，擁有無數書迷。

五、 結論

由以上敘述可知，劉大杰先生、葉慶炳先生，繼承五四以來學界傳統，均以線性、實證歷史觀、進化論視角、西方文類概念，判斷中國古代文學史料，從中選擇得以成為文學史之史料，形成兩人幾乎雷同的文學史材料。劉大杰先生以社會反應論觀點、偏重文學外緣研究方法，判斷材料、評價材料，評價《紅樓夢》為反應舊中國社會階級史實錄。葉慶炳先生以情性書寫觀點、偏重文學本質研究方法，判斷材料、評價材料，評價《紅樓夢》是一部題材、結構、敘述手法、對話書寫完美之中國古典小說傑作。兩者中國文學史著作內容，劉大杰先生偏向史、葉慶炳先生一方偏向文，形成兩幅截然不同的《紅樓夢》風貌、古代中國圖像，與不同重心的中國文學系論述系統。這當然與兩邊政府國族意識型態有關，台灣政府「側重五四新文學抒情傳統的延續與轉化³³」，中國政府側重五四新文學革命寫實傳統的延續與轉化，一個五四，台灣、中國的中國文學系各自表述、各自發展、各自形成知識系統。

在這情形之下，兩邊的文學史擁有同中有異的閱讀與論述，難怪以前教授中

²⁹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410—411。

³⁰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412。

³¹同註 8 葉書，下冊頁 410。

³²同註 19 王書，頁 37。

³³張誦聖〈臺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〉，收於氏著《文學場域的變遷》臺北：聯合文學，2001年，頁 122。

國文學史的教師，可以使用刪除意識型態字眼的方式，教授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。即便是目前台灣各大學中國文學史用書，仍是兩地文學史著作兼相採用³⁴。大概可以這麼認為：實證、線性歷史觀點，兼顧文學外緣研究與文學本質研究的文學史著作，是當今台灣中文學界，大多數認可的文學史著作方式，學生的文學史知識、古代中國文學知識、古代中國圖像，也經由此研究方式所產生的論述獲得。

本文以歷史本體論、文學本體論為視角，檢視劉大杰先生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、葉慶炳先生《中國文學史》，至於兩書書寫與政治、歷史、社會、文化、文學、權力互相影響、互相牽制的因素，則未及研究、論述，期待在後續研究中，能完整的理解、論述此一問題。

引用書目（以出版時間排列）

一、中文著作

1. 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台北：華正書局，民國 72 年
2. 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 76 年
3. 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社，1992
4.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《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》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 81 年
5. 王宏志《歷史的偶然——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》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1997
6. 陳國球、王宏志、陳清僑編《書寫文學的過去——文學史的思考》台北：麥田出版公司，1997
7. 張誦聖《文學場域的變遷》臺北：聯合文學，2001
8. 戴燕《文學史的權力》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 年
9. 龔鵬程《中國文學史》台北：里仁書局，2009 年

二、翻譯著作

³⁴ 據王基倫先生的統計，目前台灣各大學中國文學史用書，使用最多有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、馬積高、黃鈞《中國古代文學史》、袁行霈《中國文學史》、臺靜農《中國文學史》、王國瓔《中國文學史》。參見註 3 王文，頁 55。

1.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《關鍵詞：文化與社會的詞彙》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2005

三、期刊論文

1. 賈毅君〈文學史的寫作類型與文本性質——論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的三次修訂〉天津：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，第3卷第3期，2001.9
2. 康韻梅〈小說之「史」、「藝」、「趣」——試述葉慶炳先生古典小說研究的三大面向〉花蓮：東華人文學報，第十二期，2008.1
3. 王汎森〈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〉台北：新史學，第十九卷二期，2008.6
4. 王基倫〈台灣各大學中國文學史教材之分析〉台北：文訊月刊，2009年1月